

周政保，江苏常熟人

市人，研究生毕业。后人
伤，主要从事文学理论
批评，出版过《小说与
诗的艺术》、《尼采的坦
诚》、《诗的智慧》等专著。
现为《读书》杂志副主编。

感悟与预言



92131

1306.7
29

感悟与预言

周政保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DM75/27

感悟与预言

著 者: 周政保
出 版 行: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94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041-1/I·430
定 价: 9.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冯 敦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批评话语的唯一依靠，就是批评家的灵魂，或者说，批评的光彩必然源自批评家本身的现实：批评家作为社会成员的精神、趣味、品格以及对于批评对象的掌握与理解。

超现实的阐释仅仅是一种虚拟的神话。

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批评，“现实”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我们不能用戴着手套的手来抚摸现实，也不能戴着面具来行使批评的话语权力。

现代主义的萨特说：“我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生活告知了我事物的力量。”于是他“缓慢地向现实学习”，以便寻找到“现实感”。

“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结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奔忙”，但“不是逃离什么东西，而是奔向什么东西，奔向某个目的地……”这是瑞典学院授奖词中的判断。

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界正在怎样“奔忙”呢？

是现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还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后殖民”？

这里不存在绝对的断语，但批评自有选择的权力。我们置身于现实之中。中国的小说将如何行动，将怎样思索，“现实”便举足轻重。

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或正在走向 21 世纪，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应该关注这一“走向”的事实。

不言而喻，小说是艺术，但小说又不仅仅是艺术——这正如：小说就是小说，但小说仅仅是小说么？

1994 年 5 月於北京

目 录

从创作方法到审美精神的潜移

- 重新理解现实主义问题 (1)
- “寻根”：现实主义精神的实验 (12)
-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品格 (22)
- 无可奈何的感叹及传达

- “新写实小说”的别一种判断 (37)
- 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 (52)
- 军旅小说创作状态杂述 (88)
- 现阶段长篇小说缺失管见 (108)
- 就长篇小说问题答《作家报》问 (121)
- 今天抒写昨天的艺术

- 兼谈中篇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
..... (125)
- 《河边的错误》与新的小说可能 (134)
- 中国小说的出路 (138)
- 再说中国小说的出路 (146)
- 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说创作 (153)
- 文学·文化·中国西部小说 (165)
- 西部小说与“写忧而造艺” (183)
- 寓言方式与西部小说的寓言化倾向 (192)

中国西部小说的省悟与预言.....	(202)
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	(211)
阐释中国当代小说的若干前提.....	(223)
真实性：微妙的文学判断区域.....	(232)
战时文化与文艺价值观念.....	(247)
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	(256)
文学批评与文化视角.....	(263)
做一个清醒的批评家.....	(268)

从创作方法到审美精神的潜移

——重新理解现实主义问题

尽管我们不断地唠叨“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复苏”、“现实主义舒展”、“现实主义反思”，等等，但“现实主义”这一真正含义是否考虑过呢？恩格斯虽然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但只是传达了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或者说是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起码是不能认为：因为有了恩格斯1888年的《致玛·哈克奈斯》，“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就实现了完美永恒的解释——这显然不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当然，也曾经读到过不少阐释“现实主义”的论述，但说来说去，大都是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系统”。其实，如果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史的范畴来理解，问题就要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讲“现实主义”，恰恰是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范畴而运用于各种文学场合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致使它失去严格的界定而飘摇于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批评的风雨之中。

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实用的小说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规范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不是游移无定就是模模糊糊、含混不清，而且在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经常把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著名作品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但那时（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有人说这是“现实主义”在法国的胜利。可那时的法国还没有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出适当的区别：“现实主义，有时也叫做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摹仿自然为目的”（夏莱伊《艺术与美》），而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则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但恩格斯又说，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披露：尽管俄国的“现实主义”旗帜比较鲜明，但“现实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并不运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且当时的作家也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失去了界定“现实主义”的信心。事实上，理论批评家与作家们都极力试图阐释清楚这一“主义”的含义，如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又说：“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互相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可当他具体地判断或分析作家创作的时候，又觉得“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

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分别见《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俄国文学史》）。后来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概念，而六十年代又有了“无边现实主义”、七十年代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毫无疑问，由于“现代主义”的冲击或引进，“现实主义”的界定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就中国本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而言，给当代文学界以深刻印象的，也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而是两类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小说：一是以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批判黑暗社会的作品，二是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李准、杜鹏程等为代表的以抒写革命历程与讴歌革命精神为主要宗旨的、一般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样就造就了“现实主义”印象的复杂性。但无论那一类小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中，“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写实性、^①批判性、^②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可以在阅读的接受体验中获得相应印证的“真实性”。然而在后一类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的干扰，“现实主义”曾严重地被戏弄或误解过，而这种不应该产生的戏弄或误解往往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中沉积为一种排斥现实主义的“下意识”，以致使现实主义的品格与精神的张扬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是一种“怪圈”，即由于倡导目的扭曲或非文学化，欲得“现

① 所谓“写实性”，主要是指小说的描写既不违反概括选择的艺术原则，又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原生面貌，“写实”即“不变形”。

② 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审美范畴，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它的重要构成因素，任何现实主义的发展都不应舍弃；批判性是现实主义之所以富有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实主义”而终于不得“现实主义”。所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自觉不自觉地潜在着一种抵触情绪，一种对这一“主义”的失望倾向。现实主义于创作心态方面的被冷落，自然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之所以“合理”，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确实辜负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但“现实主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所造就的文学承袭性，又不能不成为八十年代的小说作家继续操持的方式——即使是暗暗地怀着反抗“现实主义”的念头，其反抗也决不可能彻底！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全部小说历史，完全可以证实这一观点。

在七十年代末，中国小说主要以它的批判性、写实性与“真实性”赢得了处在时代大动荡之中的社会阅读群体的喝采，也就是说，小说创造的“现实主义观念”获得了空前的“舒展”：题材的“禁区”垮了，以神化“英雄人物”为文学的“根本任务”不可能再贯穿了，“三突出”的原则崩溃了，那种“暴露黑暗”的批判性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可是到了八十年代，这种充满了拘谨色彩的“舒展”很快遇到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思意识或怀疑精神的增加，以及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波及，二是西方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文学之外或文学之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而这两方面的挑战都指向一个基本点，就是作家的生活观念与文学观念——首先是生活观念：生活价值取向的摇摆、怀疑，以至重新确定，势必会影响到原先的“革命现实主义”所习惯的那一套生活审视或现实判断的准则。毫无疑问，这里面不能不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旧的生活秩序坍塌了，但并不意味着新的生活秩序的立刻建立与完善。而西方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

的进入，一旦与中国的小说创造系统相碰撞，也无可避免地波动“现实主义”的唯一性原则及其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既然在中国的“现实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如此广阔的、也同样被社会认可的文学可能性及各式各样的小说途径，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除了一部分摹仿的或实验的、其中的某些作品后来被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创作外，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复苏的“舒展”中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大批小说家的创作中获得了体现，其中包括王蒙、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张承志、张贤亮、冯骥才、阿城、韩少功、莫言、张抗抗、王安忆、张洁、张炜、李杭育、郑义、刘恒、刘震云，等等。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错综纷繁的创作现象中追寻到这种变化的集结方面、即经由作家的观念更新，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究竟出现了怎样的新特征？

按照我的理解，八十年代步入中期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以下几方面呈显出自己的新特征：首先是题材意识的淡化，但这决不意味着否认小说与生活的必然关系，因为这种关系连“现代主义”小说或“先锋派”作者也都是承认的。我之所以说题材意识的淡化，是因为以前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总是尽可能地贴近火热的或正在进行的生活内容，尤其是那种为全社会所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譬如“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种题材的选择倾向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的思情之于现实（即正在进行的生活）及社会问题的关系不是那样直接了，至少是相对地变得曲折与深层化了。这在一大批所谓的“文化

小说”（或“寻根小说”）中体现得特别显著。然而，我们又不能说这些小说缺乏“现实性”或“社会意义”……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题材的选择不怎么重要了，但作品依然与生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其“现实性”或“社会意义”仍然存在——这种思情寓意的非直接与深层化，大约也是小说逐步失却社会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其次是在相当一部分小说中实现了从“英雄人物”到“普通人”到“人的存在状态”的转化。作为小说不可能不写“人”这一社会生活的主体，但同样是人物描写，其表现或传达的可能性即艺术目的，却是很不一样的。在不少写实性很浓重、真实感也很强烈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是作为一种人的或人类的生存景况而存在的，譬如王蒙笔下的曹千里（《杂色》）、莫言笔下的黑孩（《透明的红萝卜》）、阿城笔下的王一生（《棋王》）、徐星笔下的“我”（《无主题变奏》），等等。当然，这里所显示的人物描写课题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七十年代末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舒展”中发展而来的，因为我们在当时的某些小说中已经可以见到，如《黄河东流去》（上）、《雕花烟斗》（冯骥才）等。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写了“英雄人物”或写了“普通人”，而是在于人物描写的艺术目标的指向……这样，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八十年代的小说为什么对“创造典型”这一传统的人物刻画方式表示出一种冷落，因为传统的“典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的产物，它所关心的是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而很少与人的命运、人类的

(3) 与此相关的重要的文学原因还有：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崛起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现实主义”直接“干预生活”的社会功能移交给了报告文学。